

今日西方批判理论丛书 周穗明 主编

正义的尺度

——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

Scales of Justice

Re-imagining Political Spa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美〕南茜·弗雷泽 著 欧阳英 译 周穗明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今日西方批判理论丛书 周穗明 主编

正义的尺度

——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正义的尺度：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美)
弗雷泽(Fraser, N.)著；欧阳英译. —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9
(今日西方批判理论丛书/周穗明主编)
书名原文：Scales of Justice: Re-imagining Political
Spa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ISBN 978-7-208-08368-4

I. 正... II. ①弗...②欧... III. 国际政治-研究 IV. 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13352 号

责任编辑 秦建洲
封面装帧 张志全

· 今日西方批判理论丛书 ·

周穗明主编

正义的尺度

——全球化世界中政治空间的再认识

[美]南茜·弗雷泽 著

欧阳英 译 周穗明 校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3

插 页 3

字 数 175,000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250

ISBN 978-7-208-08368-4/D·1520

定 价 24.00 元

中文版序言

对我来说，今日西方批判理论丛书（《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正义的尺度》、《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伤害+侮辱》）中文版的面世有特殊的意义，它延伸出两个炽热的希望。首先，在学术层面上，我希望促进中美学界如何在后冷战时期复兴批判理论形成对话。第二，在个人层面上，我希望我以另外的方式继续延续我的家族长期以来与中国的联系。让我从这第二个希望说起。

1945年，正是在广岛和长崎之后，一个年轻的美国物理学家面临了一场道德危机。几年前，当她还是一个研究生的时候，她曾追随她的导师恩里科·费米，到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去为极端机密的“曼哈顿工程”工作。在加入这个发展原子弹的团队时，像许多一起参与的科学家一样，她曾设想，工程的目标是威胁希特勒并打败纳粹。当原子弹事实上被施放在平民身上时，是在那场战争已经有效地获胜之后，年轻的物理学家崩溃了。她抛弃了科学和一个倒退成反共偏执狂的国家，启程投奔了她在中国的兄长，著名的新闻记者和作家威廉·希顿(William Hinton，中文名字是寒丁。——译者)。

琼·希顿(Joan Hinton，中文名字是寒春。——译者)从那时到现在一直住在中国。一个中国革命的参与者和献身当代的毛主义者，她和她已故的丈夫西德·恩格斯特(Sid Engst，中文名字是阳早。——译者)用他们的大半生致力于将奶牛农场引进中国。他们是极少几个直接地经历了中国革命演变进程美国人，他们的命运随着这一政治线索而变化起伏——在一个时期被怀疑为帝国主义的特务，下一时期又被当作

国家英雄欢迎。沿着这条路，他们养育了三个子女，最大的儿子娶了我的姐姐。作为一个因为他的白种人外貌不时受到嘲笑的红卫兵，弗雷德·恩格斯特(Fred Engst，中文名字是阳和平。——译者)最后离开中国赴美国，在那里接受了他在“文革”期间错过的教育。在离开20多年之后，他去年回到了中国，现在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国际贸易学院(UIBE)教经济学。在我2008年6月写作这篇序言时，琼·希顿(寒春)小时候在佛蒙特州的家不远。弗雷德的两个女儿，我的外甥女，凯瑟琳·恩格斯特(Kathleen Engst)和吉娜·恩格斯特(Gina Engst)和他一起住在北京。

我自己只有一次访问过中国。1992年夏，我和我丈夫参加了扩大的希顿—恩格斯特家族的、长达一个月的长途旅行。从琼在北京沙河的实验农业公社出发，我们乘卡车旅行，不仅参观了旅游目的地西安和黄土高原的窑洞，而且到了当时西方人不容易去的地方，包括革命样板村庄大寨、威廉·希顿在他经典著作《翻身》中使之名留史册的张庄和洛阳的工业联合体，我们在那里住在生产东方红一号的拖拉机厂的客房里。和琼一起旅行，我们在每一处都受到像贵宾一样的接待，虽然在偏远的乡村地区不时引发一些惊奇，那里不常见到“大鼻子”。在长途旅行的卡车上，我们争论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和未来。当时刚开始美国的研究生课程学习的弗莱德喜欢引进市场机制；琼则劝告要相信群众。这次经历打上了琼的强烈的毛主义色彩，也与这次旅行的最后阶段形成了鲜明对比。长途旅行结束之后离开了大家族，我和我的丈夫和继女度过了在中国的最后两周，会晤北京和上海的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印象深刻地叩访了“两个不同的中国”和遇到了“两种不同的左派”，我在那个时候感受到，我在见证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划时代的转变。

这场转变从那以后的进展，远远超越了我1992年所可能想象的一切。而我还没有机会直接去那里看看我想了解的这场改革的效果。但是那些变化属于这套丛书的四本书所透露的“时代诊断(Zeitdiagnose)”。

一个更为宏大的部分，全球转变，同时影响了西方的、世界历史性的文化和经济、政治和技术的种种变化，正在颠覆所有我们过去熟悉的批判理论框架。这一影响将对全世界的思想家发出挑战，去重新创造适合于21世纪的批判理论工程。

让我们思考政治文化中四个已经推翻了左翼思想既定范式的划时代的变化。第一个是作为社会斗争的特殊轴心的阶级的去中心化。初期，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批判理论家赋予那种社会缺陷（这里指阶级。——译者）以特殊地位，称其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和普遍人类解放的载体。他们的观点在整个工业时代处于主导地位，将其他的社会对抗视之为衍生的和第二位的。然而今天，由于非阶级划分、身份和冲突的异军凸起，这样一种方法是高度令人置疑的。无法简化为“虚假意识”，那些反对关于性、种族划分、两性关系、宗教和语言的不公正的斗争的当代扩展，证明凭借诉求于一种目的论的历史哲学、声称确定解放的唯一主要代表的那些范式是虚假的。随之发生的挑战是清楚明白的：批判理论家必须创造对结构压迫和集体身份的新的、后形而上学的理解，它们能够阐明那些非阶级运动的斗争，以及那些继续把它们的热望连接在阶级语言之中的斗争。

与此有关的是政治文化中的第二个主要变化：作为社会正义特殊维度的分配的去中心化。正如他们把阶级斗争优先化，因而早期几代批判理论家常常设想，正义首先属于政治经济学，其第一位的目的是可分物品，特别是收入和财富的公平配置。在福特主义处于主导地位的时代，这种经济学观点阻碍关注其他类型的社会不平等，比如身份等级制和政治无权地位。然而今天，由于非经济的不公正异军凸起，一个维度的分配主义范式不再是貌似合理的。在后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中，新社会运动常常是反对“错误承认”的身份不公正和“错误代表权”的政治不公正的斗争。不仅仅是附带性质的，他们的关注拒绝专一集中在分配上。其结果是对批判理论的另一项挑战：郑重放弃经济主义的观点，我们必须创造新的、多维度的正义理解——那些能够阐明为争取承认和代

表权而斗争，以及为争取再分配而斗争的理解。

第三类主要挑战产生于政治文化中另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威斯特伐利亚”正义观的去中心化。直到最近，批判理论家悄悄地追随主流理论家，假定那种唯一的单位，其中被运用的正义是有其自己的领土国家的那种有限的政治共同体。这种在法国革命以来处于主要地位的观点，模糊了跨国界的非正义，如全球贫困和环境种族主义。然而今天，由于与全球化相关的现象异军凸起，比如全球金融和跨国化生产，美国的军国主义和单边主义，全球治理和全球变暖，威斯特伐利亚的正义观不再是不言而喻的。在一个新自由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时期，跨国的社会运动是对分配不公、错误承认和错误代表权的跨国界的抗争形式。他们的诉求不再这样被视而不见，公然地去挑战那种只在有国界的政治体内部的公民伙伴中坚持各种正义义务的威斯特伐利亚观念。其结果仍是对批判理论的另一项挑战：郑重放弃种种教条的、以一概全的概念，我们必须创造新的、后威斯特伐利亚的正义理解——能够概念化并批判全方位的当代非正义的、多层级的各种理解，一些是全球的，一些是地区的，一些是国家的，一些是当地的。

第四个挑战产生于前三个挑战的组合后果：左派缺乏对于当前秩序的一种替代选择的任何明显可信的愿景。以前，批判理论家可以诉求于某种社会主义版本，不过是非正统的，为他们的“好社会”理念提供实质。“好社会”的概念也提供了从19世纪中叶贯穿于冷战的社会斗争的焦点。然而今天，社会主义的愿望和可行性受到挑战，甚至在左派方面。在后冷战时期，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扩展蔓延，但却是以一种去中心的、碎片化的方式，并缺乏任何一个可行的替代性的理念。其结果仍是对批判理论的一个决定性的挑战：郑重放弃对过时模式的怀旧之情和对后现代多元主义的庸俗庆贺，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新的、正义的社会的全面愿景——一个将分配正义、身份平等和在每一层面的治理中广泛的民主参与相结合的愿景。

由四本书组成的这一丛书是由于这些迫在眉睫的挑战而撰写的。

紧跟身份政治学和新自由主义的出现而思考,《正义的中断》(*Justice Interruptus*, 1997年英文版第一版)评价“承认政治”与“分配政治”的分离,和后者由于前者的相对衰落。怀疑这些范式的拥护一方排斥另一方的偏执性,这本书提出一个整合每一方最好见解的“二维的”正义理论。这一理论在2004年我和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合著的《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Redistribution or Recognition? A Political-Philosophical Exchange*)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那本书中,我为再分配和承认的一种“观点的二元论”辩护,反对霍耐特的“承认一元论”。思考作为两种相互交叉的从属地位的秩序,身份和阶级,我为批判理论勾勒了一个包含道德哲学、社会理论和政治分析的新框架。

然而稍后,我开始不满足于这个框架。虽然它抓住了后冷战时期政治诉求形成的语法中“从再分配到承认”的转折,但该二维模式无法质询那种默认的假定,即正义适用的固有单位是有限的领土国家。因此,在《正义的尺度》(*Scales of Justice*, 2008)中,我在那些早期著作中处于最突出地位的经济和文化维度旁边,引进了正义的一个第三类的、“政治的”维度。在分析上不同于再分配和承认,代表权适合于将“错误构成(misframing)”的非正义理论化,错误构成出现在实际上是跨国的不平等被(错误)当作国内问题的时候。旨在阐明贯穿全球化的种种斗争,这一已修订的、三维的理论,能够就新自由主义时期谁应该将什么归属于谁,进行持续的反思。

所有这些工作已经引起美国和欧洲的批判理论家的广泛辩论。彻底审视这些辩论,《伤害+侮辱》(*Adding Insult to Injury*, 2008)再版了我与这些最主要的左翼思想家,如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艾利斯·马里恩·杨(Iris Marion Young)和瑞尼尔·福斯特(Rainer Forst)的交流。由凯文·奥尔森编辑的这本书,包括关于我对再分配和承认之间断裂的评价的对话;关于如何将那两种方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地整合到社会正义的辩论;关于再分配

和承认是否真正穷尽了正义的充分意义，或是否有必要具体表现一个第三类的、政治的维度的交流，以及关于我的理论的哲学理解的讨论。

尽管这本书给予我结论性的评价，该辩论决没有结束。我的热切希望是，这套丛书的出版将激发新一轮对话交流。没有任何事情能比延伸家族传统更让我欣慰，通过与中国思想家关于在这个我们参与的、迅速发展的全球化和后冷战的世界批判理论的未来的对话，发展我的家族与中国结合的传统。不包括来自站在 21 世纪全球发展前沿的这个国家的观点，任何批判的理论化或许都不可能是充分的。

对于这次机会，我感激周穗明教授，她构思了这套丛书的想法并使之付诸实践，而且还翻译了其中一本。同时衷心地感谢其他译者于海青、欧阳英和高静宇，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秦建洲先生。

南茜·弗雷泽

于美国佛蒙特州，沃塞爾

2008 年 6 月

译者前言

《今日西方批判理论》丛书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这套丛书是我从南茜·弗雷泽教授赠我的一批著作中精选出来的，并得到了南茜·弗雷泽本人的认可。它们包括4部著作：南茜·弗雷泽的《正义的中断》(*Justice Interruptus*, 1997年)；南茜·弗雷泽和阿克塞尔·霍耐特合著的《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Redistribution or Recognition? A Political-Philosophical Exchange*, 2003)；南茜·弗雷泽的《正义的尺度》(*Scales of Justice*, 2008)和南茜·弗雷泽等著、凯文·奥尔森(Kevin Olson)主编的《伤害+侮辱》(*Adding Insult to Injury*, 2008)。关于这套书系的各本书之间的思想联系，详见南茜·弗雷泽的中文版序。这套丛书的冠名，也是今年5月在2008年度布拉格会议^①再次见面时由南茜·弗雷泽提出、我们两人共同敲定的。

我策划这套丛书在中国出版的初衷，是受2007年5月布拉格会议的促动。在那次会议上，南茜·弗雷泽教授做了“反正义的规范”^②的主题发言，引发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会上欧美各国批判理论学者展现的丰富主题、灵动思维和批判精神，使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崭新的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及其百年发展史的研

① 布拉格会议是指“哲学与科学”年会，是批判理论学派的一个国际会议组织。该会议是哈贝马斯和南斯拉夫“实践派”领袖R.苏贝克(R. Supek)、M.马尔科维奇(M. Marković)和G.彼特罗维奇(G. Petrović)等人在1978年创办的，是当时东西方哲学家对话的一个平台。南斯拉夫解体之后，该年会移师布拉格，每年由捷克共和国科学院全球化中心主办。

② 南茜·弗雷泽：《反规范的正义》，周穗明译，载《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07)，总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1—79页。

究者，^①我为自己对批判理论第三代当前理论发展和队伍状况的认识贫乏感到汗颜。尽管国内近几年来开始引进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但是关于承认理论的整体研究现状仍然与西方批判理论近年来的迅速发展存在太大的落差。从这个意义上说，布拉格会议为我们中国学者认识当代批判理论的复兴推开了一扇窗，而认识南茜·弗雷泽则是我的幸运。为了从基础建设做起、推动对第三代的理论研究，为了把当代批判理论最新最好的东西引介给中国学界，我觉得，作为专业学者，组织这套丛书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我们义不容辞。

译校这套丛书的收获超出了我的预期。在这一过程中，我意识到，我们可能找到了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一座思想富矿，对它的开掘将有助于掌握当今西方知识左派的主要思想资源和发展走向。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也许不只是从事一般的代际划分、概念渊源和规范定义等细节考察，而是对这一新发展阶段所创立的新范式及其完成的理论转型、根本实质和当代现实意义给予强烈关注。在我看来，围绕承认理论的这场争论的内容不仅限于道德哲学，也不是黑格尔的旧瓶新酒，更不是简单的政治哲学概念之争，而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古为今用，它大大地发展并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社会批判理论。在理论上，它代表了批判理论的当代复兴；在政治上，它体现了批判学派的知识左派在全球化时代为构筑新社会主义战略的理论基础的真诚努力。因此，围绕承认理论的这场争论，标志着霍克海默以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当代发展新阶段。

^① 我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下册）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下，于2004年由学习出版社出版；此前，我主持的国家基金项目《现代化：历史、理论、反思——兼论西方左翼的现代化批判》（九五国家课题一级成果），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出版；2008年，学习出版社出版了我主撰的新著《20世纪末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江苏出版社最近则推出了我和王玫主撰的《西方左翼论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一书。通过这些著作，我们阐述了对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成果。对批判社会理论第三代新演变的研究，将会发展我们对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研究。

本文将简略概括批判理论第三代以承认理论为中心的学术争论的产生及其历史背景,并基于此重点阐述这场争论的基本概况、主要论题及争论各方的基本观点,最后,对第三代批判理论的历史地位、重要成就及其对我们今天世界的现实意义做出评判。

当代批判理论家尽管对“承认”概念的具体内容有不同诠释,但是对“承认”概念本身似乎具有高度共识。所谓“承认(德语是 *anerkennung*, 英语是 *recognition*)”是一个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概念,“承认”概念的基本含义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认可、认同或确认;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主义冲击的背景下,该概念也突出了各种形式的个体和共同体在平等对待要求的基础上的自我认可和肯定。

承认理论的兴起并不始自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社会批判理论。1978年,路德维希·谢普(Ludwig Siep)发表了《作为实践哲学之原则的承认》一书,率先考察了费希特和耶拿时期的黑格尔的承认理论,并把后者的承认理论区分为个体与全体的承认和个体与社会制度之间的承认,以及在社会制度中反映的个体自身及其利益。^①从现实看,20世纪70、80年代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开始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的公共政策实践,此后因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崛起,查尔斯·泰勒、威尔·金里卡等主流政治哲学家相继提出了他们的承认政治理论。诚如泰勒所指出的,“对承认的需要,有时候是对承认的要求,已经成为当今政治的一个热门话题。”^②

① 这里关于路德维希·谢普的介绍,参见丁三东:《“承认”:黑格尔实践哲学的复兴》,《世界哲学》2007年第2期,第86页。该文作者认为,当前研究者对承认概念的关注均源于Ludwig Siep该书。

② 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董之林、陈燕谷译,载于《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90—337页。

以承认为主旨的身份(认同)政治^①风靡一时,绵延至今。而1992年阿克塞尔·霍耐特的《为承认而斗争》的问世,标志着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传统的批判理论对承认理论研究的正式介入,并在批判学派内部、乃至西方政治哲学界引发了一场持续十多年(1992—2008)的广泛讨论。客观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承认理论在西方学术界迅速升温,俨然已成为社会批判理论第三代的学术标签。

纵观承认理论及其争论的发展沿革,可以看出,承认理论的兴起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迫切的现实需要,集中反映了西方左派对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社会和国际社会矛盾的深刻思考。

首先,批判学派的承认理论是对西方社会后现代化悖论的一种解读。现代化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传统强项,也是其批判主题之一。自霍克海默、阿多诺以来,形形色色的社会批判理论的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前景的人道主义忧虑和关怀。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理论家认为,与现代化过程伴随而来的理性化、工具化是法西斯极权主义产生的根源。他们批判工业文明的工具理性,认为它导致了启蒙理性的衰落和毁灭,造成了法西斯极权主义的产生,并主张以非理性主义的精神价值抵制工具理性在“科学”、“客观”旗号下的抽象化和片面化,反对人性的异化。在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中,法兰克福学派传人马尔库塞的工业社会批判矛头直指现代化的弊端,认为现代化产生了经济发展和精神沦丧、人性异化的这一悖论,并号召一场解放人的本能欲望的“真正的革命”。马尔库塞因此成为60年代西方青年造反运动的思想旗帜。此后20年,批判理论的批判锋芒一度被近30年来强势的保守的自由主义浪潮所遮蔽。批判理论第二代主将哈贝马斯从非理性主义的伦理批判转向理性主义的合理化批判,将批判理论引向规范研究。他在政治上认同西方

^① 关于 identity 的译法,我更倾向于译为表示同一性、一致性的“身份”,而不是有动词意味的“认同”。

民主，主要倡导立足于主体间性的商谈政治，构建当代西方参与民主的理论基础。随着当代全球化使西方社会进入后现代化阶段，批判理论第三代承认理论的崛起使批判话语再度走上前台。承认理论将批判理论的社会批判传统与当代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相结合，解读西方后现代化阶段的社会冲突和危机，分析了全球化的后现代化悖论——一方面是后现代化的经济社会文化成果的空前积累，一方面是贫富不均、社会边缘化和文化排斥，大量个人和群体被排斥于现代化的新成果之外。承认理论揭示了后现代化的正负两方面效应，批判各种形式的社会不公正，要求通过实现多个层面的相互承认，在规范与经验结合的基础上重塑社会正义理论。从这一意义上，承认理论保持了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的传统特点，二者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悖论的新旧批判一脉相承。

其次，批判学派的承认理论是对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新问题、新矛盾的一种理论回应。从当前政治实践看，全球化的负效应给西方社会本身造成了剧烈的社会分裂和社会痛苦。一方面，妇女、少数族裔、同性恋者等日益成为西方国家在全球竞争中首先遭受新的“社会排斥”的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而全球化时代的劳动危机同样冲击和波及中产阶级人群，白领也进入日益扩大的失业群体；另一方面，在当今西方和整个世界，人们提出了现代历史上最广泛的平等要求，出现了最多样的新形式的社会抗议运动：有色人种、女性、少数族群、生态主义者、同性恋者、农民，等等，各种散落在边缘的社会力量的能量在激烈地尽情释放，各种形式的新社会运动此起彼伏，几乎所有人都在要求平等的承认。而与此同时，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正在被全球化掏空，难以适应发展中的新矛盾和新诉求。西方国家的社会、道德、法律的发展成就处于危险中。这正是承认理论及其争论发生的现实背景——社会民主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在实践层面的矛盾冲突。一边是传统的平等主义的再分配，认为分配不公是错误承认的基础；另一边是新颖的对差异敏感的批判传统，认为错误承认导致了分配不公；二者之间互不相容。凯文·奥尔森(Kevin Olson)在《伤害+侮辱》一书的导

言中指出,这正是1995年时大家的普遍感觉。也就是说,全球化背景下的紧张状态,是承认及其争论进入公共讨论视野的现实原因,批判学派的承认理论由此应运而生。

此外,选择以承认理论切入当代矛盾的讨论(承认理论出现的主观因素),是西方批判理论家和知识左派在当前困境下一种选择。比如,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文化承认”是左翼政治的有用概念吗?》^①一文中,不支持讨论当代问题的这种文化主义方式,认为多元差异的文化承认解决不了共同人性的问题,这种复杂的学术论证方式也不适于大众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他认为,美国学术左派高估了哲学的功用。承认理论的哲学复杂性无助于左派实现多数政治的努力。他特别指出,当代理论中的这种文化主义转折是20世纪60年代激进运动退潮后左派失望的产物。罗蒂其实是说,文化主义不过是成长于60年代的那一代知识左派为摆脱失语的一种努力。在我看来,尽管罗蒂有其深刻之处,承认理论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不失为西方知识左派的一种选择。姑且不论霍耐特、弗雷泽等社会批判家只是在批判理论中引入了文化主义维度,并非标准意义上的文化主义者,仅从承认理论引发的热议看,批判理论新一代的承认批判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当代西方现实的命门,有旺盛的理论生命力。

二

霍耐特提出的“为承认而斗争”标志着批判理论第三代的崛起。近年来,批判理论第三代在围绕承认的争论中形成了自身的理论特色。这一争论以霍耐特和弗雷泽为主要代表,在16年中大致经历了四个阶

^① 见本丛书中南茜·弗雷泽著,凯文·奥尔森编,高静宇译的《伤害+侮辱》一书第一部分。

段的发展。

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曾长期担任过J.哈贝马斯的助教,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社会哲学教授,从2000年起担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正宗传人。

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美国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大学哲学与政治学系教授,美国著名的激进女性主义学者和政治哲学家,是目前西方批判理论的重要领军人物之一。

第一阶段的讨论以是否存在再分配与承认的矛盾为中心,首先在霍耐特和弗雷泽两人之间展开。1992年,霍耐特的《为承认而斗争》发表,突出承认作为中心理论范畴的地位。他对黑格尔早期的承认理念赋予现代意义,提出了现代承认的三种形式:爱、权利和团结。在一个好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从爱和亲密关系中获得“情感承认”,从公民之间的平等权利和同等尊严关系中获得“法律承认”,从群体成员的价值共同体关系中获得“团结承认”。个人从三种承认中形成自信、自尊和自豪。因此,承认就是反对任何形式的蔑视。1995年,南茜·弗雷泽发表了《从再分配到承认?》一文,指出当代左翼理论中存在承认和再分配的分裂,认为基于民族、族裔、种族、性别和性行为的差异承认的文化诉求不断增加,牺牲了经济再分配的诉求。她认为,今天的正义要求二者的统一,要求克服“再分配—承认的难题”,建立一种同时容纳再分配和承认两种诉求的替代框架,以批判所有这些群体所遭受的经济与文化的不平等和非正义。^①1997年,弗雷泽在《正义的中断》(已收入本丛书)一书中,进一步分析了当前所谓“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文化左派与社会左派的分裂,并把这种分裂作为“后社会主义”状况,号召长期相互争斗的左翼各派在更为广阔而统一的斗争中联合起来,为“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加“文化上的解构”而斗争。弗雷泽

^① 弗雷泽这篇重要文章见本丛书中南茜·弗雷泽主著,凯文·奥尔森编,高静宇译的《伤害+侮辱》一书第一部分。

揭露多元文化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产生对立的深层概念基础的尝试，作为承认理论最初的争论观点，在 1995 年后引发了欧美左派的热烈反响。在 1996—2000 年间，欧美理论界许多重量级人物如理查德·罗蒂、朱迪思·巴特勒、艾利斯·马里恩·杨等人也加入了是否存在再分配与承认的对立的争论。这方面的具体争论观点见本丛书中《伤害 + 侮辱》一书的第一部分。

第二阶段的争论已经把再分配和承认的对立作为既定前提，核心是如何把社会正义的这两种范式在理论和实践中准确地结合起来。2000 年以后关于再分配和承认如何结合、弗雷泽的方法是否成立的具体争论，详见本丛书中《伤害 + 侮辱》一书和第二部分中弗雷泽与克里斯托弗·泽恩(Christopher Zurn)等人的辩论。这一阶段的争论最突出地体现在 2003 年出版的弗雷泽和霍耐特合著的《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已收入本丛书)一书中。在这一对话中，两人共同的观点是：“承认”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关键词，差异族群争取平等身份的文化斗争在当代已不可忽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经济不平等在增长，分配正义问题同样不可漠视。因此，对正义的理解必须包含为分配而斗争和为承认而斗争两组关系。同时，两人共同拒绝经济主义，反对把承认简化为分配的附庸。此外，两人“都渴望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理论”，致力于构建一个在规范上整合道德哲学、社会理论和政治分析诸层面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

然而，两人对再分配和承认的结合方式认识有所不同。霍耐特将承认构想为基础性的、统摄性的道德范畴，而将分配视为派生物，主张道德基础上的“规范一元论”。因此，他把再分配的社会主义理想重新解释为承认而斗争的一个亚种。南茜·弗雷泽反对分配被包含在承认之下的这种“承认一元论”。因此，她提出一种“观点二元论的(perspectival dualist)”分析框架，将承认和再分配两种诉求整合为共同的正义基础和互相不可化约的正义维度，认为惟有这一框架，能够理解当代社会阶级不平等和身份等级制的重叠。在她看来，争取正义的社